

# 大學周刊

2011年1月11日 周二出版 第499期 编辑部电话：010-82614599 电子邮箱：dxzkbx@163.com daxue@stimes.cn

## 复旦“立宪”能否给力高教改革

□本报记者 陆琦 孙琛辉

“有关复旦‘立宪’的事，我是从媒体的报道得知的，学校内部还没有动员过。”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教授在电话里说。葛剑雄所说的“复旦‘立宪’”，即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去年年底向媒体宣布将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这则岁末年初很“给力”的教育改革新闻引来各方关注，与此同时，改革也正在复旦大学悄然进行着。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已经都发给了现任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要求在1月15日之前反馈意见。至于学校章程的日程表还不清楚。”葛剑雄刚从外地出差回上海，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发到他手里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修订好章程后，学术委员会就要换届了，校长希望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从而给学术委员会在学术问题上更多的发言权。”

复旦BBS上也转载了复旦“立宪”的新闻，不过截至发稿时只有唯一一个直接评论该事件的跟贴：“校长能自我限制权力，心胸要宽的，如果真能做到依法治校、民主治校，必将名垂校史。”

的确，复旦大学在校长带领下，行政层对自己动刀子，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此举能否实现既定目标，我们静观后效。

### 没有章程的大学缺乏自主性

1999年1月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也就是说，我国高校在成立之初，就应该都有章程。复旦大学将制定《复旦大学章程》何以成为新闻？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给出了答案：“十几年前教育部曾邀请我参加研究、制定大学章程的工作，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实际上，我国大学至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章程。”

在《高等教育法》实施12年之后的今天，明确有《大学章程》的不过几家——2005年12月，吉林大学通过《吉林大学章程》，学校发布信息时称“率先”在国内高校中推出大学章程；2006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发布并实施《上海交通大学章程》；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章程》初稿形成，学校称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力争2008年内颁布实施，但后来没有下文……

“这说明，我国大学作为政府附属机构的惯性依然很大。”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认为，一所大学有大学章程，未必就能说其有自主性，但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大学章程，肯定可以说其没有或很少有自主性；而没有自主性的大学，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依法治校的。

陈武元告诉记者，在国外很难看到没有大学章程的著名大学，尤其是欧美大学；在日本，尤其是7所旧帝国大学等国立大学在2004年实行独立行政法人之前，都先后制定了大学宪章，对大学的学术（教育与研究）、组织、管理运行等作出了纲领性的规定，这是基于对大学法人内涵的深刻理解，也是捍卫大学法人的独立性所必需的。

“大学的章程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宪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宪法，那么这个国家的运行肯定会出问题，大学也是如此。”陈武元说。

陈武元甚至认为，大学的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大学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章程。“大学内部权力配置无章可循，反映了我国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的根基的脆弱性”。

中国传媒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何雪莲则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章程，也不在于章程是否虚设，问题在于大学校长、学院院长想不想作为。

“当前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清晰的权力边界，大学校长、学院院长作为空间很大，就看你想不想干。就一己私利而言，干，意味着自我设限冒风险；而维持现状，则可能八面风光左右逢源。”何雪莲说，“政校分离、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要维持现状不可避免楚歌四起，时代将拖着不愿走的人走，复旦大学头脑清醒，选择了顺应大势。”

### 权力失衡阻碍大学发展

从杨玉良的讲述中不难发现，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将成为复旦“立宪”的重要内容。

“复旦大学起草大学章程，是‘985工程’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的重要步骤，是大学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在陈武元看来，只要制定并落实好大学章程，就有可能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的问题。

朱永新认为，大学有三个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市场权力。

“三者应该在高等教育内部得到有序的

★大学的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大学至今还没有真正的大学章程。大学内部权力配置无章可循，反映了我国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的根基的脆弱性。

★理想很重要，但是对于我国长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关系还是要考量的，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

★树立管用的大学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学章程更管用。思想是大学的天职，学术自由实质是思想自由，没有触及思想解禁的“破茧”，其实只破了一半，此问题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动。

★大学内部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联动，最主要的还是缺乏政府部门变革的话，大学的改革仍然是一场梦。



平衡。每个权力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出路，高等教育才能和谐地发展。”朱永新说，“目前来说，行政权力太大，大到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难以以为继的地步，所以迫切需要调整三个权力的结构——相对削弱行政权力、壮大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

“复旦大学让更多的教授进入学术委员会，让更多的行政管理人员退出学术委员会，可以说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的行动之一。”在朱永新看来，大学“去行政化”还需要许多其他行动。比如，大学校领导和院系领导在担任领导期间，不要评职称、不要拿科研项目、不要拿各种奖励，就是通常所说的“官不和民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不参加学术委员会还要重要。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学校内部的事务，而利用学校内部资源去学校外部争取个人利益更可怕。”

朱永新指出，复旦大学的改革会面临一些“习惯性”障碍。“因为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要交出权力，另一部分人会获得权力，失去权力的肯定会不适应、不乐意”。不过朱永新认为这些问题通过制度建设自然可以解决。

陈武元则认为，大学在进行内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资源如何科学、合理配置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根据责权对应的原则进行处理”。

陈武元提到权力与利益紧密相关，而利益冲突与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利益冲突越大。因此，“大学内部的‘横向分权’比大学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纵向分权’更难”。

“纵向分权更多是卸责。”何雪莲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鼓励高校创业，鼓励经费来源多样化，实行高校属地化，实行学费并轨，不再对学生统包统分，通过把经费、学生就业这样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推向边缘、基层和高校，政府下放的多是责任和危机，而保留的则是控制权。

“横向分权更多是自裁，是实打实地丧失领地，行政资本和学术资本不再互搭梯子，学校官员不再通吃，对学校官员来说，分权等于是自宫，难以下手。”何雪莲表示，“问题在于，即使行政领导层主动自宫，长期形成的官本位文化，还要等上很久很久才会在心理层面消失，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要花上很久的时间才能从官僚体制的洞穴中爬回到正常的轨迹。这是最大障碍。”

### 让理想照进现实

在对外宣布复旦“立宪”时，杨玉良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大学需要理想的灯塔照

亮现实的道路”。

朱永新表示赞同，他说：“仅仅当理想主义者是不够的，校长应该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朱永新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一方面要“上天”，即意味着怀抱梦想、追求卓越永不放弃的冲动；另一方面要“入地”，懂得尊重中国的现实和学校的现实，不想入非非、好高骛远，根据校情、国情来考虑问题。

“理想很重要，但是对于我国长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关系还是要考量的，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朱永新说。

那么，如何才能让理想照进现实？

“复旦大学当前改革约束的是行政权力，突出的是学术权力，背后秉持的是学术自由的理念。”何雪莲建议在大学内部结构治理方面再突出两个理念。

一是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何雪莲指出，对学术权力的强调无意中遮蔽了另一个主体——学生的权利。国内高校在对外宣称时，无非是宣传业绩（有多少博士点、重点学科、国家实验室、精品课、科研经费、科研成果和奖励），而国外高校宣传的，却是如何对学生用心（教学和课程资源的丰富，学校网络和交通的便利，校园生活的多彩以及师生关系的融洽）。

“所有作为的大学非常清楚，学生与教师同为大学荣耀之源，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用心善待学生。”何雪莲说。

二是经营大学的理念。在何雪莲看来，大学在当代，不仅仅是“知识的共同体”，而且还是“知识的经营体”。大学要有自我造血功能，大学校长要有经营意识。“在美国，校长这个职位本身是个筹钱的话”。

“经营大学在当代尤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光靠政府的投入已经‘喂’不饱大学，另一方面，政府‘包养’得越少，大学自主的空间就越大。”何雪莲说，“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注意以卓越的品质和声誉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获取较高的科研经费、社会捐赠及其他服务收入，提升教学和研究的活力和水准。目前国内正在探索的董事会或者理事会制度，正是体现了经营大学的理念。”

### 期待政府的行动

说起复旦大学的此次改革，让葛剑雄感到欣慰的是“校长抓住了问题的重点，意义积极”，但他也提出，要让章程真正成为学校的“宪法”，有些重要问题不明确，很难推进。比如，由谁授权，是学校的教师学生还是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责任由谁来界定？哪些由学校

### 莫让大学精神被功利侵蚀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近日对当今大学教育向功利倾斜的感怀，又将教育功利化的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

教育的功利内涵自古有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已将个中滋味一语道破。只是，在当今社会，教育向功利倾斜得有些过了。许多家长已经把子女教育当成一种投资甚至是投机，他们期望获得的回报是：子女有份好工作，待遇优厚，身份体面。这是人之常情，也无可厚非。

但令人心寒的是，本该超脱于这种利益纠葛的象牙塔也未能免俗。面对学生的就业压力、学校的名声，大学从办学理念到办学模式都越来越功利化。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和课程安排

上一味迎合市场，强调实用性，教育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学生之间似乎就只剩下了交易关系。试问，在这样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子，如何能够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诚然，迎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相反这对学校提高就业率、学生获得更好的前途是大有裨益的。可是，大学要做的远不止是为学生提供一块获取工作的敲门砖。

大学应当有其担当。今天的大学更应捍卫人文精神，教育学生成为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气质，在世俗和公众的压力下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并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今天的大路更应如灯塔般照亮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行之路。因为，教育不仅是个人获取成功的关键，还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基石。（陆琦）

### 中国大学评论

## 教育家是决定因素

□卢晓东

刚刚过去的2010年作为新世纪20年中承上启下的转折之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注定使其成为不平凡的一年。《纲要》凝结了从共和国总理、教育学者到广大民众的智慧和心血，出台之后几无有深度的批评。可以说，《纲要》足以成为未来1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未来10年的任务无疑是实现《纲要》提出的目标。在高等教育方面，这些目标包括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很好地回应“钱学森之问”，培养出一代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其他教育阶段的改革，高教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适应等等。从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视角看，这些目标非常高远，实现之路绝非坦途。

那么，实现《纲要》目标的关键在哪里呢？有人说教育投入是关键，为此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能否切实达到4%的目标被格外关注。

有人则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是关键，为此国家出台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力争在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四方面取得突破。

真正的关键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自己、团结自己、加强自己，才能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而不是失败的战略问题，其中他指出干部问题的重要性，“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如果说《纲要》是教育改革的“政治路线”，那么教育家（而非教育官员）无疑就是《纲要》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因素。

有人说，目前中国教育界教育官员很多，但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寥若晨星，就是屈指可数。讨论教育家的文章中举例的个案仍然不是陶行知，就是蔡元培。此论当然有些过头，但教育“去行政化”如此引发社会共鸣，仍足以证明一点，那就是现在的教育家数量确实不足以支撑《纲要》的大厦。缺乏大批的教育家，《纲要》的目标难以实现。

那么，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教育家是否已经成为我们的战斗任务了呢？从教育部目前的举措看，似乎还没有。中组部推出了“千人计划”，但关注于在国家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引进战略人才和领军人才回国工作。如果说教育家是帅才，“千人计划”的目标则是将才。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特殊性，教育家很难大规模从海外引进，唯有立足于国内培养，但从目前已有的政策和举措看，教育家的培养问题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有一种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流行观点，那就是教育家不需要培养，我们只要让一名专家——比如说院士担任校长，他自然就会成为一名教育家。情况果真如此吗？

目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已然作为一名教育家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在一段访谈中，他回忆了在中科大的10年校长任期中，他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所经历的3个阶段。

第一阶段，认为“大学里课程设置极其落伍，教材也很陈旧”。针对这一点改革之后他发现效果不大，“检阅课程设置，引进新教科书，这是表面的事情”。

第二阶段，“开始反思深层次的东西，鼓励国内很多高校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效果仍然不大，他发现“学生的创新气氛还是在衰退”，这还不是最深层的问题。

第三阶段，认识到“大学精神，实际上比教学思想、教育制度还要深刻，比教科书课程设置更深刻”。

当认识到第三个阶段时，朱清时才把握住了教育规律，但其在中科大校长的任期已经结束。在其校长任期中，朱清时是因为“无为”而赢得尊重，其“无为”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科大坚持不扩招，二是以原生态迎接教育部本科教育评估。离任时，他说“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其潜台词在于其上任上所为实际并未起到很大作用。在认识到教育规律后，朱清时勾勒出几乎符合教育规律的南方科技大学蓝图，正在肇路蓝缕以期“有为”。

朱清时作为院士而成为教育家，以其10年实践和积极的探索反思为代价，这表明院士并不会自然成为教育家。如果他作为教育家而被培养，更早了解和把握教育规律，他会为中科大留下更多值得纪念的东西，这所有很好基础的高校会更快进步！

危险的一点是，如果大学校长和教育官员没有把握教育规律，不是一名教育家而又想有所作为，同时他也有权力和资源有所作为，其作为很可能是胡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一定少不了折腾和反复，《纲要》提出的远大目标在短短的10年中将难以实现。

以上讨论有3点结论：第一，实现《纲要》目标，教育家是决定的因素；第二，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教育家应当成为我们的战斗任务；第三，目前的政策对大批教育家的培养有所忽视，这值得警惕。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访谈中指出：“要让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2010年岁末，一周内7所高校一把手履新，教育部也有3位副部长到任，是否教育家办学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主编 崔雪芹  
本版责编 陆琦